

大象

学术

译丛

[美] 詹姆斯·希恩 (James J. Sheehan) 著

黄公夏 译

暴力的衰落

 大象出版社

暴力的衰落

Where Have All the Soldiers Gone?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Europe

[美] 詹姆斯·希恩 (James J. Sheehan) 著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暴力的衰落/(美)希恩(Sheehan, James J.)著;黄公夏译.
—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3

(大象学术译丛/陈恒,毕明主编)

ISBN 978-7-5347-6091-4

I. ①暴… II. ①希… ②黄… III. ①政治事件—研究—欧洲—19世纪 IV. ①D7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0311 号

Copyright © 2008 by James J. Sheehan

Copyright licensed by Fletcher & Parry LLC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Elephant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大象学术译丛

暴力的衰落

[美]詹姆斯·希恩(James J. Sheehan) 著

黄公夏 译

责任编辑 刘东蓬

责任校对 牛志远 霍红琴

书籍设计 付铤铤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开元路 18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63 千字

定 价 52.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351

大象学术译丛弁言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对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特别繁荣；研究的方法、手段、内容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一切对我们相关学科都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但囿于种种原因，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各科的发展并不平衡，也缺少全面且系统的学术出版，不同学科的读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各类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能够翻译各类专业书籍的译者队伍也日益扩大。为此，我们组织翻译出版一套“大象学术译丛”，进一步繁荣我们的学术事业：一来可以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具体的研究途径；二来为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来也满足不同学科读者的实际阅读需要。

“大象学术译丛”以整理西学经典著作为主，但并不忽略西方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目的是为中国学术界奉献一套国内一流人文社会科学译丛。我们既定的编辑出版方针是“定评的著作，合适的译者”，以期得到时间的检验。在此，我们恳请各位专家学者，为中国学术研究长远发展和学术进步计，能抽出宝贵的时间鼎力襄助；同时，我们也希望本译丛的刊行，能为推动我国学术研究和学术薪火的绵延传承略尽微薄之力。

编者

献给娜塔莎、亚历山德拉和萨莉

政治，直到历史尽头，都将是良知和权威际会的场所，人类生活的伦理因子和强制因子会在那里互相渗透，达成种种踌躇和不安的妥协。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道德的人类和不道德的社会》(*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献给娜塔莎、亚历山德拉和萨莉

致 谢

xx

本书的构思始于 2001 年春,当时我很幸运,是柏林美国学院(American Academy)的成员。书中大部分内容写于 2004 和 2005 年,那段时期我是斯坦福人文中心(Stanford Humanities Center)的成员;最后的修改在柏林的社会科学研究院(Wissenschaftszentrum)完成,是为 2006 年夏季。我要感谢美国学院的加里·史密斯、斯坦福人文中心的约翰·本德尔和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于尔根·科卡以及这三家杰出机构的所有员工,感谢他们的友好招待和慷慨协助。我还受惠于约翰·西蒙·古根海姆基金(John Simon Guggenheim Foundation)、保罗·戴维斯家族以及斯坦福人文及科学学院(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ciences)的资助。

达妮埃拉·布莱、杰西·考夫曼和梅甘·威尔科克斯-福格尔在研究中给予了可贵的帮助。吾友兼同事戴维·肯尼迪和诺曼·奈马克阅读了此书的早期版本,提出慧见良多。我的经纪人唐拉姆从头至尾参与了此出版项目,没有他的帮助本书就不可能面世。霍顿·米夫林出版社(Houghton Mifflin)的阿曼达·库克是一位杰出的编辑——严厉苛刻,也给人鼓舞和支持,每一页上都有她影响的痕迹。从初稿到成书,在这段修成正果前的漫长跋涉中,威尔·文森特一直承担着助手的工作。

我把最深厚的谢意献给玛格丽特·拉维尼娅·安德森,了解她和我的人不会为此惊讶,因为她是理想的读者、身边的批评家、学术上的楷模以及许许多多。

于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

2006 年 12 月

20 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xiii

2003 年 2 月 15 日是周六,欧洲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1],抗议即将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在伦敦,估计有 100 万人涌上特拉法加广场,挤满从泰晤士堤到欧斯顿火车站的街道;巴塞罗那和罗马有 100 万人游行,米兰有 60 万。50 万人无畏于刺骨的寒冷,聚在柏林的提尔公园,几乎与该市夏季举行的爱情大游行(Love Parade)人数相当。每一处聚集的人群都是和平的。有一些人被逮捕,但没有暴力。参与示威的人形形色色:有一些皮装打扮的未成年人,还有披着巴勒斯坦式头巾或身着无政府主义标志性黑衣的青年,他们看起来不那么面善;但绝大多数穿着暖和的冬季外套和时髦的鞋子,他们是可敬的市民——退休老人、中年学者、工会成员、高中生和大学生。有许多示威者举家出动,父母和祖父母自 60 年代以来头一次参加游行,孩子们在人生中首度体验政治示威中愉悦和艰苦相杂的独特感受。一份德国报纸称此事件为“普通人的起义”。

很多示威者带着横幅和标语牌,有些是组织者提供的,其他是自制的,宣告了他们走上街头的各种动机:“巴勒斯坦自由”,“不要为石油流血”,“疯狂牛仔病可以休矣”,“美国,真正的流氓国家”,“泡茶不打仗”,还有(我个人最爱的)“别再有这种事”^{*}。不像抗议越南战争的示威,没有人对被宣战方抱有任何同情;没有伊拉克国旗或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相片。对

[1] 我对示威活动的记述基于以下报纸: *Guardian*, 2003 年 2 月 17 日; *Observer*, 2003 年 2 月 16 日; *Berliner Zeitung*, 2003 年 2 月 17 日。

* 原文为双关语,另可理解为“你们扔下的就是这种东西”。标语上还有飞机投弹的图像。(以 * 开始的脚注,为译者所加。)

大部分人,真正的焦点不是谁对谁错,而是战争是否是答案。73岁的托马斯·埃利奥特,一位来自埃塞克斯郡巴西尔登区的退休律师,解释他为何来参加这次也是他人生首次的政治示威:“我记得战争,”他告诉一名记者,“和轰炸在伦敦造成的后果。战争手段只有绝对必要时才能使用。”柏林当地一所高中的两名同班同学——14岁的尤迪特·罗德和里卡达·林德纳,对有人来问她们为什么游行感到惊讶。“战争,”她们说,“不是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一位支持和平的游行者——77岁的老兵希尔德·维塔舍克补充道:“解放柏林时我们已经历过战争——不要再有了,绝不要再要战争(nie wieder Krieg)。”在一座又一座城市,当你的视线扫过外头的人山人海,看到最多的往往是单写一个“不”字的标语牌。

一些观察家视2月15日为欧洲历史的转折点之一。前法国内阁大臣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宣称,一个新的“欧洲国家”^[1]已在那天诞生。数月后,在一篇原标题为“2月15日:是什么联合了欧洲人”的文章中,两位欧洲知名学者于尔根·哈伯马斯和雅克·德里达呼吁欧洲人“制衡美国在国际舞台和联合国中的霸权主义单边政策”^[2]。如施特劳斯-卡恩、哈伯马斯和德里达论称,欧洲对美国军事主义的抵制可为欧洲人创造出新的自我认同,而这一认同最首要的基础是将弃绝战争立为国家政策的纲领。

就在大规模示威前10天的2月5日,出版了一本罗伯特·卡根的著述:《天堂与权威:新世界秩序下的美国和欧洲》(*Of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卡根曾短暂地效力于里根政府,较早就开始提倡用美国的实力在全球散播民主,是最早力促对伊拉克开战的一批人之一。这本著作很快就跻身畅销书行列,其基础是一篇名为《权威与软弱》(“Power and Weakness”)的文章,出现在2002年春季的一份相当不起眼的期刊《政策审议》(*Policy Review*)上。卡根试图借用不久前一本关于性别差异的

[1] Garton Ash, *Free World*, p. 46.

[2] Habermas, *Westen*, p. 45. 另外,在2003年5月31日的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上,有一篇文章刊登了哈伯马斯撰写的哈伯马斯-德里达宣言。

书的标题来概括欧洲和美国的差异：“在主要战略和国际问题上，”^{〔1〕}他宣称，“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大西洋两岸的纷争不仅是欧洲人反对某个单一事件的结果，也不仅是反对美国政府某些特殊政策的结果。“是时候停止虚伪了，”卡根写道，“假装欧洲人和美国人共有相同的世界观，甚至假装他们共有同一个世界。”欧洲人已对权威背过身去，宁可活在后历史（*posthistorical*）的天堂中；美国人则认识到真正的世界霸权和军事实力仍然不可或缺。^{xxx}“造成大西洋两岸间鸿沟的原因，深埋在长久以来的发展过程中，而且很可能继续存在下去”。

卡根的分析，如哈伯马斯和德里达对新欧洲认同的呼吁那样，折射出伊拉克战争在大西洋两岸所点燃的辩论火光。我们会在本书最后一章重新审视这些争辩。但现在，以上内容已足以让人明白，在三者笔下，欧洲人和美国人差异的核心是什么：21 世纪之初，认可暴力是解决国际争端必要手段的美国人比欧洲人多得多。2003 年，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2〕}，询问在特定状况下战争是否为实现正义的必要手段，被调查的美国人当中有 55% 的人强烈同意。而在法国和德国只有 12% 的人持同样观点。

21 世纪初的欧洲有强大的经济，但对把实力转化为军事力量兴趣寥寥。欧洲各国用经济、文化和法律的实力影响世界，用它们处理各国关系和处理国家与公民关系时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和体制来影响世界。相反，美国以军事基地、盟约和协议所编织成的巨大、紧密的全球网络，来推行真正的全球影响和霸权。美国已成为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所说的“最后一个真正的主权欧洲民族国家”^{〔3〕}。发动战争的能力和意愿是独立主权国家的传统必备要素，而这一传统已发生了改变。改变是如何发生的，至少在欧洲是如何发生的，就是本书的主题。

远在伊拉克冲突暴露出欧美关系的深长裂隙之前，一些学者就指出人们

〔1〕 Kagan, *Paradise*, pp. 3—4. 关于对卡根论点的批评分析，见 Lindberg 的文章。关于卡根的生平，见 Packer, pp. 17—24。

〔2〕 *Economist*, 2004 年 6 月 5 日。

〔3〕 Garton Ash, *Free World*, p. 119.

对战争能成就目标的信心在下降,这不仅出现在欧洲,而且出现在全世界范围内。在《撤离末日》(*Retreat from Doomsday*)一书中,美国政治科学家约翰·米勒(John Mueller)坚持,大型战争——有别于内乱和组织犯罪而言——正逐渐被历史所淘汰。按米勒的观点,曾令战争成为人类事务中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的价值观和前提假设正在瓦解;人们不再相信战争是有效的政治手段,不再相信为“胜利”所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因此,人们相信战争不是人类经验的固有组成部分,而会像其他曾看似无药可救的社会罪恶一样最终消弭,例如决斗和奴役。当米勒在1989年首次将其观点公布于众^[1],若干评论家,尤其是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和约翰·基根(John Keegan)这类战争研究者对此表示怀疑,怀疑他们投入一生杰出学术才能的主题正渐渐被历史遗忘。但到了90年代,有许多博学多闻的观察家,甚至包括基根和霍华德,也开始惊叹战争与国家的古老关联是否确实在走向终点。

本书将提出两个中心论点:第一,战争的消弭不是全球现象,而是欧洲现象,是欧洲20世纪独特历史的产物;第二,1945年以后战争不复存在的状况,在欧洲范围内创造出了焕然一新的国际体系,以及新形态的欧洲诸国。

我们将看到,令现代欧洲战争的破坏力如此惊人的历史发展进步,是如何最终在漫长血腥的欧洲史中、在欧洲的国际社会间首次驱除了国与国的暴力。例如,政治与社会的民主化给予欧洲各政府动员人力资源、组建空前大军的能力,由此极大增强了战斗的规模和激烈程度。但民主化也鼓舞了一个信念,即那些总是承受着战争重负的普通人,应对国家是否、何时进行战争的问题拥有发言权;而有了战争与和平的选择权后,他们会选择后者。类似地,工业生产力的增长使得制造、部署破坏力前所未有的武器成为可能。但工业化也拓宽了人与人、国与国的联系,织成相互依存的关系网,要求并支持和平的交易关系。很多人意识到,一次大型战争将破坏甚至摧毁这些关系,给欧洲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不可估量的伤害。

[1] Mueller, *Retreat*; Keegan, *War*; Howard, *Invention*. 另见 Joas 和 Michael Mandelbaum 的著述。阐述米勒理论的最新作品是 *Remnants*。

1900年,欧洲国际社会由认识到欧洲战争潜在风险的人掌控。为了控制这些风险,政治家维持着一套复杂的体制,旨在维护和平,或在无法维持和平时遏制国家间的暴力。我们不必对这一“欧洲一致原则”*(concert of Europe)的效果和仁慈评价过高,它给欧洲以外的暴力行为和内部的暴力威胁留了很大的活动空间,总是由私利心所驱动,而且像每一个国际体系一样,通常服务强权的利益、牺牲弱者的利益。尽管如此,20世纪初所存在的国际秩序看起来运转得相当良好。

19世纪中,欧洲的阵亡人数明显少于18世纪,更比不上血腥程度非同一般的20世纪。1648—1789年,欧洲各国进行了48场战争,其中有一些,像18世纪中期的七年战争,延续了数年,波及全世界。1815—1914年,欧洲只有5场牵涉到两个列强的战争;延续时间和涉及地域都有限,只有一场战争的参战大国超过两个。从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直到1914年伟大战争**爆发,欧洲各国间维持着和平。这曾经是欧洲历史上最长的无战争时期,此纪录直到20世纪末才被超越。

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的漫长和平中,我们能找到后来最终主宰欧洲公众生活的平民***政策和体制的历史根源。这些政策和体制指向内部、针对国内目标,寻求激励经济增长,促进商业,为公民提供新种类的服务。就如1945年以后一样,这些发展同当时前所未见的经济大增长不可分割。整个19世纪后半,欧洲的制造业及农业产量一直长势惊人。尽管人口增多,人均收入仍获提高,国内生产总值也一样。增长分布在地理上不平均,其利益分配也不平均,但1900年的欧洲社会正不断变得更有序、更平和、更繁荣。

虽然在和平中生活,20世纪初期的欧洲人一直面对着战争的可能。“我

* 拿破仑时代后所用的一个术语,表示欧洲各国在保持领土及政治现状这点上心有默契但未明确阐明的状况。大国在别国发生内乱时有权有责进行干涉,并将大国的集体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对于发生的问题,各大国一般会采取协商。

** 即第一次世界大战。

*** 在本书中,除非特别说明,“平民”一词皆指“非军事的”、“与军事相对的”。有时会用“民事”、“民间”来代替。

们这一时代的列强，”^{〔1〕}德意志第二帝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在1879年告诉一位俄国外交官，“就像因机缘而坐在同一辆马车上的旅行者，互相陌生、相互观察，当其中一人把手放入口袋，边上的人就会准备好自己的左轮手枪，以能抢先开火。”没有哪位负责的政治家会打算放下戒备，把视线从旅伴身上挪开；不管是出于意外或蓄意，其中某人或许会拔出武器的可能性永远也无法不当回事。备战是政治家最紧要的职责——当然，不是他唯一的职责，但是最优先的。经济繁荣、商业活力、社会福祉，都是值得为之付出努力的目标，都有助于国家的强大和稳定，但若国家的存续受到威胁，它们就一文不值。创建并维持一支能够进行且赢得现代化战争的军队则是安全的保障。如一位德国政治家在19世纪将终时所言：“如果哥萨克人来了，再好的社会改革又有何用？”^{〔2〕}

1914年夏，列强的领导者们做出抉择，认为除战争外别无他法。其中有几入也许是积极寻求一场欧洲战争，但没有人想要后来所发生的那种战争——一场欧洲人运用他们夸张的人员物资动员力来摧毁彼此的战争。这是一场全民（democratic）战争，波及每个欧洲人的生活；也是一场工业战争，经济生产的首要目标是造成死亡和荒芜。战争吞噬了数百万生命，其中大部分是青年；吞噬了巨量的资源，这全都是无意义的浪费。它将古老体制连根拔起，扰乱了新创立的经济体系，动摇了自1815年来有助于抑制列强的微妙态势。

审视着战后的残垣，很多人确信大型战争定已成为历史；欧洲绝对经不起下一次。但另一些人反省着别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和平来得太早，比胜利来得更早，比敌人的灭亡来得更早，比社会的净化来得更早。对这些人来说，战争能带来建立新政治秩序所需的英雄主义、操纪和同志精神。20世纪20和30年代的欧洲被很多意识形态分歧所割裂——民主和独裁、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右派和左派——但最重要的是国内外政治暴力的摒弃者和信奉者间的分歧。最终，暴力的倡导者主宰了时运，把欧洲拖入更恐怖的第二场战争，民

〔1〕 Bond, p. 27.

〔2〕 这番话是 Friedrich Naumann 于1895年所说，引自 Mayer, Weber, pp. 45—46。

主和工业的力量再一次被锻造成破坏力巨大的武器。

如果对战争无益的广泛共识足以确保和平,那么一次世界大战就应足够。但不像奴隶制或决斗能随其文化基础的朽坏而慢慢消弭,只要一个国家有战斗的准备和意愿,战争的危险就始终存在。在俾斯麦比喻的马车上,必须所有的陌生人都确信同行者中无人会摸武器,安全才会出现。安全是整体的,无法独自获得。

欧洲在1945年后产生了整体性的安全感,当时美国和苏联在这块大陆上加诸了一个新秩序,把欧洲划分并组织成一个相当稳定与和平的体系。这一体系成了西欧各国逐渐转型的温床。它们成为平民国家,即仍有战争实力却无法从战争中获得任何利益的国家。结果是暴力被侵蚀*(eclipse):其重要性下降,而且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被其他东西遮蔽——那就是国家刺激经济增长、提供社会福利、确保公民个人生活的需要。暴力被侵蚀是逐步发生的。这是一场缓慢无声的革命,藏匿于平凡的景象背后,但其激烈程度与欧洲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相比都不逊色。为了理解这一革命的性质和意义,我们必须回溯到一个战争仍是欧洲各国头等要务的时代。

* 原文为双关语。eclipse的原意是日食,引申义为声誉、权势的丧失。指暴力失去了过去的地位,同时被经济需要遮蔽,就如太阳被月亮遮蔽。

目 录

致谢

1

序

20 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1

卷一

在和平中准备战争(1900—1914)

1

1. “没有战争,就不会有国家”

3

2. 和平主义与军事主义

20

3. 身处暴力世界的欧洲人

38

卷二

一个战争造就的世界(1914—1945)

61

4. 战争与革命

63

5. 20 年的休战期

84

6. 最后的欧战

109

卷三

没有战争的国家

133

7. 战后世界的基础

135

8. 平民国家的兴起

155

9. 为何欧洲不会成为超级霸权

177

跋

平民国家的未来

197

参考书目

203

索引

228